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李庄抗战文化的 群众音乐传播方式

钟文婷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200)

摘要: 李庄作为抗战时期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因“同大迁川, 李庄欢迎”的十六字电文接纳内迁机构,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抗战”精神。彼时宜宾群众性音乐活动蓬勃发展, 同济大学二胡研究社等组织通过《光明行》等曲目传播救亡信念。当代李庄依托历史空间、全媒体平台及校社联动, 探索作品化、场景化、媒介化、组织化的音乐传播路径, 激活集体记忆。其精神内核——举全镇之力、风雨同舟的共同体意识, 在抗战胜利 80 周年及春晚等契机下持续回响, 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情感纽带。

关键词: 李庄; 抗战文化; 群众音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记忆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编号: 2025SYJSCX128)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5.461

1940 年, 同济大学等学术机构为躲避战乱, 四处寻求安身之所。李庄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较为便利, 管辖乡镇较多, 安置能力强, 为省内外文教机构及其人员的迁入提供了必要条件, 为李庄抗战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李庄的乡绅罗南陔等人向同济大学发出了“同大迁川, 李庄欢迎, 一切需要, 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当时, 世界各地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准确送达, 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这段历史奠定了李庄“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的崇高地位。

一、李庄抗战文化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国家建设的展开, 当年内迁的机构陆续迁出, 李庄回归平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李庄的古建筑群——如当年作为同济大学工学院的东岳庙、作为医学院的祖师殿、梁林旧居所在的月亮田等, 都作为重要的历史遗迹被保存下来。

进入 21 世纪, 李庄的文化价值被重新系统性地发掘。当地政府秉持“保护为主、开发为辅、保持原貌、修旧如旧”的原则, 对同济大学旧址、中央博物院旧址、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等实施了抢救性保护修缮。李庄先后荣获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全国海峡两岸交流基地、首批天府旅游名镇等荣誉, 学术和文化界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2023 年央视中秋晚会全程在李庄月亮田景区取景。毛晓彤等歌手唱了《月》, 歌名跟地名刚好对上, 月亮田一夜之间被带火了。

2025 年正好是抗战胜利 80 周年, 6 集纪录片《抗日烽火中的李庄》在央视纪录频道 (CCTV-9) 播出。这片子没走煽情路线, 而是把“文化抗战”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算是头一回用纪录片体量把李庄的历史价值推到了公众面前。

到了 2026 年, 宜宾成了春晚分会场。春晚的流量自然落到了李庄头上——它被放进“跟着春晚游宜宾”精品线路, 成了核心站点。从一首歌到一部纪录片再到一台晚会, 李庄这几年其实是被央视的镜头一步步推出来的。

作者简介: 钟文婷(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二、宜宾抗战时期音乐活动的历史脉络

2.1 抗战时期（1940-1946）的群众性音乐活动

抗战时期，宜宾地区的救亡宣传活动分为几大阵营，分别是宜宾戏剧界的救亡宣传活动、宜宾妇女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宜宾师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及著名爱国人士的宣传活动。其中与音乐相关的宣传活动首先体现为歌咏活动宣传和戏剧表演宣传。据《宜宾抗战记忆》记载，1938年，抗战一周年，中共宜宾中心县委领导成立了“宜宾县商会抗敌晨呼队”，在“打到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后，便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等激昂的抗日歌曲。还有高县南城学生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每逢节日便去附近的场镇做宣传，通过表演节目、张贴抗日标语，唱抗战歌曲等进行宣传。宜宾抗战剧团常演的节目有《抗争》《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事变》《日出》《山河泪》《血祭“九一八”》等，他们进行了三次很有影响的下乡巡演，在巡演沿途演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宜宾先进爱国妇女也成立了歌咏队、宣传慰问队，与商会领导的“抗日歌咏队”“晨呼队”等配合，把宣传活动做的有声有色。宜宾师生也用歌咏与戏剧的形式参与到抗战宣传中来，其中南溪中学加入了晨呼队，每天黎明，这些师生就走出学校，用激昂的歌声唤醒人们，南溪中学的晨呼队也成为了南溪城中最活跃的抗日宣传队伍。这些以歌咏为主要形式的宣传活动，因其通俗易懂、感染力强，成为当时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重要途径。

2.1.2 民乐社团与音乐传播

宜宾抗战时期的音乐传播已呈现出组织化、专业化的特征。据孔夫子旧书网收录的珍贵史料《光明行》二胡曲抄显示，1946年，迁驻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成立了“二胡研究社”，并以社团名义发行曲谱集。该曲谱集收录合奏曲9首、独奏曲16首，共计25首作品，其中包括刘天华的《光明行》《良宵》《病中吟》，储师竹的《长夜曲》《不想他》《凯旋》《楚些吟》，以及陆修棠的《怀乡行》等抗战时期广为流传的曲目。

这批曲目的选择跟抗战时期的精神需求扣得很紧。《光明行》《前进操》明显是在喊必胜，《怀乡行》《长夜曲》一听就是那种想家又回不去的滋味，《凯旋》则干脆盼着胜利那天了。有意思的是，这些曲子由同济大学二胡研究社“发行”——不是正式出版，大概是油印或手抄的谱子，能在校内校外传开，说明传播已经不只是个人拉着玩，而是有了组织推动。这其实就是“文化抗战”在音乐领域落地的一个小切口。

三、李庄抗战文化群众音乐传播的当代路径分析

群众音乐的传播，可以看作一种文化记忆的激活与再生产过程。扬·阿斯曼讲过一个基本道理：群体靠共享的符号（比如仪式、文本、图像）来维持认同，但这些符号得不断在当下被重新演绎，才不会变成死东西。拿李庄来说，抗战时期那些群众音乐——比如二胡研究社传过的《光明行》《怀乡行》，或者学生唱过的那些歌——正好承载了民族危亡关头的集体记忆。它们不是躺在档案里的旧谱子，而是每次被唱响、被拉响的时候，都在把那段历史重新拉回眼前。

（一）作品化的叙事建构：从历史记忆到艺术史诗

群众音乐的传播不仅依赖空间展演与媒介扩散，更需要具有叙事深度和艺术完整性的“作品化”载体。考察同类抗战文化地的实践经验，云南师范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主题，自编自导自演了音乐舞蹈史诗《西南联大》。该剧采用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综合艺术形式，再现了联大师生“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教育救国历程，《西南联大》就像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带着观众穿越时空，大家被“把生命融入使命的‘青春报国’信念”吸引、打动，并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围绕特定历史事件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确实能把零散的记忆串成一条线，借助审美体验传递集体认同。顺着这个思路看李庄，群众音乐的传播其实也可以往“作品化”的方向走一走。具体怎么走？光靠节庆活动唱几首歌、演几个节目，热闹完就没了。不如试着做一部能反复演、常驻下来的东西。可以由宜宾市政府出面牵头，联合当年内迁的同济大学，再加上宜宾本地的高校（比如宜宾学院、四川轻化工大学）和几个专业文艺院团，一起攒一部以李庄抗战为背景的音乐舞蹈史诗或者交响组曲。选哪些素材来编？十六字电文肯定跑不掉，同济师生在李庄的教学生活、梁思成林徽因在那儿写《中国建筑史》的经历，这些都可以往里装。名字不一定现在就定，但像《李庄·1940》或者《长江之头书声朗》这种方向，至少能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讲什么的。当然，大制作有难度，也可以同时做点小东西，比如合唱套曲、独唱艺术歌曲，方便学校合唱团、社区艺术团自己排练演出。一方面，李庄需要一张固定的、随时能拿出来的文化名片，而不是每年等纪念日才搞一次活动；

另一方面，讲故事比喊口号管用——观众跟着剧情走，慢慢就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仅仅是感动一下。说到底，就是通过作品把共同体意识做扎实。

（二）记忆的场景化唤醒：历史空间的沉浸式展演

抗战时期的宜宾，群众音乐主要依托街头、庙宇、学校等公共空间进行传播。从1938年起，宜宾县民教馆兴办“抗日宣传大字报”，编辑《民众旬刊》，组织民众剧团，举办学生歌咏、论文比赛等，宣传抗战，开展民众文化、艺术教育活动。据记载，此类活动教育了诸多观众。把音乐放到日常生活空间里演，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舞台和观众之间没那么分明。走在古街或庙宇里，冷不丁撞上一段当年的抗战曲、歌曲——熟悉的场景里冒出点陌生的东西，往往比坐在音乐厅里更容易让人心动。

当代李庄抗战文化传播实践中，有两件事值得看：一是把当年的街头剧和抗战歌曲拿到现在的地点去演，二是在此基础上加了点新花样。当地文艺团体和志愿者可以在古街、席子巷、慧光寺这些地方，隔一阵就复排一次经典作品。这种在景点里冷不丁演起来的方式，有人管它叫“快闪式”演出，它有个明显的特点：演出不在剧院里头，而是直接放在当年发生事情的地方。游客正逛着，突然听到《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响起来，现场的空间和那段历史的声音叠在一起，不少人有种“恍惚回到过去”的感觉。比起静态的博物馆陈列，这种体验可能更抓人。它同时调动了听觉、视觉，整个人站在那里，能直接感受到当年的气氛。人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遇到，往往更容易被带进去，而不是觉得在被动接受教育。

（三）媒介的日常化建构：短视频时代的认同再生产

场景化传播更看重那种“在现场”的瞬间冲击，而全媒体传播做的是另一件事——把抗战文化一点点揉进日常生活里。当下的传播格局变化不小，短视频这类平台，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接触信息、形成认知的主要入口。李庄要想把这段历史传出去，绕不开这个现实。不是“要不要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的问题。

2025年春晚宜宾分会场的亮相，为李庄的媒介化传播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春晚结束后，宜宾文旅热度却丝毫未减。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春节假期宜宾市已举办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超1400场次，吸引市民游客参与超443万人次；全市开放的53家A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217.26万人次。

这里有两个变化需要注意。一是传播主体：不再只有官方在推，民间力量也加入进来了，是“官方+民间”的路子。二是传播内容：短视频确实零碎，有人担心会消解历史的严肃感，但反过来看，它把抗战文化做成了低门槛的东西，年轻人刷着刷着就碰上了。有些不到一分钟的视频，画面和配乐抓人，一下就能让人心里一动，说不定就想再去翻翻背景资料。这有点像詹金斯说的“参与式文化”——观众不光被动看，还会转发、评论、自己再创作。

（四）主体的组织化培育：从学校到社区的认同内化

无论是场景化唤醒还是媒介化传播，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人”的身上。群众音乐区别于专业音乐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群众性”——民众不仅是听众，更是参与者、创造者。因此，如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培育传播主体，是李庄抗战文化得以薪火相传的关键。

学校在主体培育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抗战时期，李庄的学生曾是抗日宣传的先锋，这一传统在今天有所延续。据《产教之声》2025年12月10日报道，宜宾市李庄中学的师生创作了一部作品叫《李庄长歌》，把那段历史和文化记忆做成了可传唱的东西。学校把这件作品纳入了课程体系，不是只在课外活动里演一演，而是让文学、历史、音乐几门课的内容碰到了一起，推动了文学、历史、艺术与情感教育的有机整合。宜宾其他中小学也可以此借鉴，让地方抗战文化走进教材、走进课堂、走进活动。通过地方抗战文化进课堂的生动实践不但能增强学生对于自己家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还能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继承和弘扬李庄抗战文化精神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感情。

社区在主体培育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宜宾宣传”报道，2025年9月19日上午，宜宾李庄同济纪念广场上，退役军人合唱团现场拉歌，《当那一天来临》《我是一个兵》的旋律响起来，在场的不少人跟着进入了那段抗战记忆。当时正在举办的是四川省首届“爱我国防”文化创意大赛发布活动，整场活动分了四个篇章：“烽火·万众同胞”“忠魂·奋起反击”“赤焰·民族脊梁”“砺剑·强军有我”。每个篇章用了不同的艺术形式——情景舞蹈、沙画合唱、诗剧、歌伴舞等等，把抗战历史和当下的国防主题串在了一起。这一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通过设立主题赛事，可以激发社会各界的创作热情，产生一批优质的传播作品。这些作品既是群众参与的成果，又能反过来成为进一步传播的素材，形成良性循环。

四、李庄抗战精神的时代回响：从“举国一家”到“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升华

李庄抗战文化通过群众音乐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展演与传承,其背后更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核——即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个西南小镇以“举全镇之力、倾全民所有”的胸怀接纳内迁学人、支援抗战前线的集体行动,这一行动本身,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质朴、最生动的实践表达。当李庄百姓将外来的学者、学生视作自家人,当宜宾的码头工人把前线将士的安危看作自家事,这种地方观念的集体认同,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土壤。大力弘扬李庄抗战精神中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爱国精神,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改革共识,凝聚发展力量。正如本文第三章所分析的群众音乐传播方式,无论是当年的抗战歌咏,还是未来的音乐舞蹈史诗,其根本目的正是将这种“举国一家、风雨同舟”的精神符号化、可传唱化,使之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从1940年那封改变命运的十六字电文,到2026年春晚舞台上李庄古镇的璀璨灯火,李庄始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回看抗战时期的群众音乐传播,是一代一代人在用声音接续一段精神。今天再唱起这些歌、讲起电文的故事、走进慧光寺或同济纪念广场,就不只是隔空看看历史,而是实实在在地接过了那份记忆。

参考文献:

- [1] 王佳.李庄抗战文化研究[D].西华大学,2019.DOI:10.27411/d.cnki.gscgc.2019.000221.
- [2] 宜宾抗战记忆/宜宾市档案局(馆)编著.—成都:天地出版社,2015.9
- [3] 李思凡.“你是那束星光,落在我身旁”[N].昆明日报,2025-09-16(003).DOI:10.28508/n.cnki.nkmb.2025.003014.
- [4] <https://4g.scdaily.cn/wap/scr/b/20260220/1071698.html>
- [5]高永贵,罗先凤.地方文化对青年学生思想的滋养研究——以宜宾李庄抗战文化为例[C]//Singapore Management and Sports Science Institute,Singapore.Proceedings of 2015 3rd Asian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s (Advance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15) 上.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宜宾学院,2015:88-91.
- [6] 许察金.中国李庄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J].攀登,2015,34(06):46-50.

Mass Music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Li Zhuang's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ong Wenti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cultural center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Zhuang accepted relocated institutions with the sixteen-character telegram “Tongji University moves to Sichuan, Li Zhuang extends a warm welcome,” giving rise to a unique spirit of “cultural resistance.” At that time, mass music activities flourished in Yibin, with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Erhu Research Society of Tongji University spreading the belief in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pieces like March of Brightness. In contemporary times, Li Zhuang has leveraged historical spaces, all-media platforms, and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o explore music communication pathways characterized by work-based, scene-based, media-based, and organization-based approaches, thereby activating collective memory. Its core spirit—the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unites the entire town in solidarity through thick and thin—continues to resonate on occasions such as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 serving as an emotional bond connecting history with the present.

Keywords: Li Zhuang;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Mass Music;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Memory